

# 邊緣、多元族羣與基督教 ——以民國時期宣道會在川黔東陞的 傳教行動經驗為考察中心(1921-1934)

倪步曉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 一 緒論

自晚清伊始，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以下簡稱基督教）在華差會，就差派傳教士到西南地區，開拓華夏邊緣地帶的傳教活動。其中在貴州省多族地帶，中國內地會和循道公會的工作成效最為顯著。<sup>1</sup> 內地會以黔西北地區赫章等縣為中心，循道公會是以威寧石門坎為中心，他們在苗族和彝族羣體建立較為龐大的信仰羣體。<sup>2</sup> 然而，西差會主要集中在貴州西部的佈道區，東部的傳教活動卻極為薄弱。<sup>3</sup> 清末民初在四川境內的傳教活動，以中國內地會為最大差會，其次是英國的聖公會、公誼

<sup>1</sup>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修訂）》，蔡詠春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7），頁469～473。

<sup>2</sup> 胡其瑞：〈基督新教循道會與中國內地會在黔西北苗族地區傳教工作之比較〉，《台灣宗教研究》第12卷1、2期合刊（2013年12月），頁84。

<sup>3</sup>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修訂）》，頁472～473。

會和美道會佔多數。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的《中華歸主》（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指出當時四川省各差會有七十六所總堂，僅少於廣東、江蘇二省。就實際佈道工作而論，四川當為全國總堂數最多，佈道工作最好的一省。不過，四川省佈道區較為集中於成都與龍安之間，省內的中部和東北部傳教事業相較發達，但仍然有待開闢的傳教區尚多。<sup>4</sup> 尤其是四川東南地區與貴州東北部交界比鄰的多數縣區，因位於山嶺重疊、交通不便、道路險峻、地瘠人貧、暴力衝突等原因，及至民國初期仍是基督教尚未開墾的區域。

民國初期，這一區域的傳教需求，引起華中宣道會的關注，他們遂後投入川黔東陞的傳教工作，給本地帶來基督教信仰。再則，美國宣道會差會檔案中，傳教士報告等資料述及川黔地區的工作佔較大篇幅，由此反映二十世紀上半葉宣道會甚是重視在川黔的傳教工作。然而，基督教差會在西南的研究中，雖然論著有關宣道會在川黔傳教的內容，多數是不太詳述；<sup>5</sup> 另外則在史料篩選下拼湊出不完整的傳教敘述。<sup>6</sup> 鑒於

---

<sup>4</sup>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修訂）》，頁577～578。

<sup>5</sup> 羅腓力和梁家麟論述宣道會在華地區傳教的部分，川黔教區所佔篇幅甚少。羅腓力：《宣道與中華：宣道會早期在華宣教史略》（香港：宣道，1997），頁227～243；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1998），頁38～40。此外，秦和平是研究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區傳播史的學者，在他相關的著作中，對宣道會在川黔地區的傳播活動亦甚少論述且有誤差。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區傳播史》（成都：四川人民，2003），頁148～149；秦和平：《基督宗教在四川傳播史稿》（成都：四川人民，2006），頁157～159。

<sup>6</sup> 目前研究宣道會在川黔傳播較為詳細是文潔的〈民國時期宣道會對渝東南毗鄰地區族羣文化差異的認知與行動策略研究〉。作者主要探討宣道會在民國時期貴州和四川東南部邊界及毗鄰民族地區的傳教活動，並勾勒出先從漢人區再到多民族聚居區的傳教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宣稱引用美國宣道會原始檔案，卻在全文未見一處標註原始資料，有不少的論述和觀念欠缺史料佐證。其次，作者認為宣道會在渝東南民族地區，因受到民、官、匪三條的干擾影響，調整策略，順應異質民風，藉助地方力量「發展少數民族文化」。至於如何具體「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在文內卻語焉不詳。此外，這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武裝紅軍綁架宣道會傳教士，向差會勒索贖金，該事件引起《宣道周刊》及美國媒體多番報道。有關宣道會是否繳交贖金的立場和傳教士逃離的重要議題，卻未見其論述。無論箇中緣由何在，不能不說是該項研究中的一大缺失。文潔：〈民國時期宣道會對渝東南毗鄰地區族羣文化差異的認知與行動策略研究〉，《民族學刊》總第61期（2020年5月），頁51～58。

此，本文採用歷史文獻研究法，對差會刊物、傳教士私人記錄等原始資料，以及民族調查報告和地方文獻等資料的詳盡爬梳，試圖整理出較完整的宣道會在川黔東陞的進程，亦關注宣道會的組織、信仰方式、宗教生活如何在當地樹立良好的社會印象。再者，本文以微觀視角探討宣道會在邊緣處境與本地族羣關係的演進，由此反映宣道會與漢苗族的互動中具有邊緣特徵的傳教現象；再藉還原傳教士被土匪、共產黨搶劫俘虜的經歷，呈現宣道會在暴力、恐懼的邊緣社會中，採取何種應對措施的傳教行動。因此，在基督教精英傳統的敘事之外，關涉基督教在川黔邊陞的研究，仍然是亟待開拓的課題，本文旨在關注宣道會在社會邊緣的傳教進程，對了解基督教在西南族羣傳播多樣性的意涵有所裨益。

## 二 宣道會在川黔東部邊陞的開拓與發展

辛亥革命後，政體易轉，基督教在這階段的教會事業順遂發展，歷史學者通常稱為「黃金時期」。<sup>7</sup> 當時來華的許多青年傳教士，深受社會福音學說的影響，拒絕把街頭佈道或派發福音單張作為他們的首要傳教任務。<sup>8</sup> 他們在佈道活動的基調和上一代傳教士所熟悉的福音派佈道方式有所不同，揚棄了傳統的聖經觀、超越上帝觀和基督論，也不再主張「認罪悔改」為傳教進路，而是順應民族主義情緒及青年知識分子尋求國家現代化和改革的熱誠，遂將基督教宣傳為「中國的希望」和國家實力的基礎，福音被闡釋成一種民族復興的方法，救治各種弊病的能力。<sup>9</sup>

---

<sup>7</sup> 裴士丹：《新編基督教在華傳教史》，尹文涓譯（台北：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台灣基督教文藝，2019），頁120～125；邢軍著，趙曉陽譯：《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 1919-1937》（上海：上海古籍 2006），頁40～60；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8），頁142～145。

<sup>8</sup> V.H. Rabe,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 188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81.

<sup>9</sup> 賴德烈 (Kenneth S. Latourette) 著，雷立柏等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9），頁525。

當傳教事業出現轉向社會福音的趨勢，傳教士圈子也表現出空前高漲的興趣，而宣道會的傳教模式非但沒有改變，更是在傳統福音路線上顯得十分活躍。

自1889年宣道會傳教士來華以後，相繼建立華中、華南、華西和上海等教區。及至民國初期，宣道會華中教區的範圍包括安徽、湖北和湖南省，已成為宣道會在中國的主要教區，其傳教策略有兩項重要的任務，除了推動本地教會邁進自立模式之外，拯救人靈魂則一直是宣道會的核心內容，從而他們無不積極拓展「未得之地」的傳教領域。故此，這一時期宣道會華中教區的傳教路線，以打破地理、文化等框架，延續救贖人靈魂為目標，尤其關注當時仍未開墾的福音「荒蠻之地」。

### （一）宣道會華中教區向西拓展的策略

二十世紀初，繼任宣信（A. B. Simpson, 1843-1919）為宣道會主席的雷保羅牧師（Paul Radar），於1921年3月抵達上海與宣道會東亞地區代表舉行傳教會議。這次會議其中有九位華中教區的傳教士出席，會議的諸多事項之一，即再提倡宣道會長遠的計劃，「在沒有其他傳福音團體工作的地方建立教會，竭盡全力傳福音。」<sup>10</sup> 此後，在夏季的宣道會華中差會年度會議上，立即便委派傳教士開展勘探工作。翌年，美國宣道會海外傳教部派遣杜浦爾牧師（W.M Turnbull）來華負責評估和調適各教區的教務。12月份他參與華中差會的會議之時，看到傳教士對開拓工場充滿熱忱，會議決定騰出人力和資源進入湘西比鄰的四川和貴州東部地區開荒。當時他記載到：

華中會議為採取一些宏偉的舉動，以犧牲中國中部為代價，向前進一步。長沙的傳教士陶華勝（Ebba Torvaldson）提議將他的工作

---

<sup>10</sup>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 1888-1934* (C&MA National Archives), 207.

地點轉交一個屬靈的姐妹傳教機構時，所有在場的傳教士內心深受感動，雅學詩（Benjamin Alexander）牧師推動了這一提議，雅學詩曾經是經歷危險打開了這座城市的福音。<sup>11</sup>

這項計劃在1922年正式實施，華中宣道會結束在長沙二十二年的工作，將原教會的信徒轉交給遵道會（Lutheran Brethren Mission）承辦，並出售了福音堂及差會房產，從中得到的財務收益用於四川和貴州的傳教事宜。<sup>12</sup>

傳教士陶華勝、羅崇光（Ezra Roth）與兩個中國傳道助手受華中差會委派，於1923年3月10日從湖南常德出發，前往川黔地帶，進行實地考察。<sup>13</sup> 在兩個月時期，他們涉足貴州東北部和四川東南部相鄰的十多個縣區。<sup>14</sup> 於八月宣道會華中差會年會議上，陶華勝和羅崇光提交相關調查報告，其內容主要記述到：

經過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在宏偉的山脈之間旅行，穿越肥沃的農業、生產鹽和油的區域，或者是在無盡的罌粟田之間，總是會遇到好奇的人羣。所經過繁忙的村莊，進入擁擠的城區，在那裏對福音是未知的，基督是聞所未聞的。他們的靈魂多麼渴望已顯露出來。不到一年前，內戰發生在其道路上，留下深紅色印記，在某一個時刻，我們看到死者和垂死者的雙手。在另一個地區，強盜是鮮血染成的，他們是失敗的絕望者。有一部分人將罌粟汁抹在偶像的嘴唇上，身體健壯的人被這鴉片打敗了。然而，各地對福音的興趣很大，從字面上看，成千上萬的人聽到了福音，許多

---

<sup>11</sup> W.M Turnbull, "God's Providences in China and Beyond,"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II, no.13 (26 May,1923): 207-8.

<sup>12</sup> 陶華勝牧師在口述資料中提到：「長沙是中國中部最大的站。原來教堂非常小。他聽說長沙有一處房產在出售，位於兩條主要街道的拐角處。我們以18,000元的價格買下了它，之後我們又以29,000元的價格把它賣給了其他差會。通過這筆錢，我們開設了六個傳教站。」 Rev. E. Torvaldson transcription of oral history (3-4 April, 1962),10.

<sup>13</sup> "The Kweichow-Szechwan Mission Surveys and Launching a Beachhead," 3.

<sup>14</sup> 四川省的東南部是今日的重慶東南部。

人接受了《聖經》和福音冊子。我們所探索的地區，包括十五個完全沒有福音佔領地區，居住人數從 23,000 到 411,000 不等，總人數超過三百五十萬。這些地區不僅是漢人的居住中心，在該地區的南端是苗族社羣的家園。<sup>15</sup>

在這份報告裏表明川黔東部區域廣大，始終卻未有基督教入駐，這就足以吸引宣道會傳至該地的動因。為此，宣道會擬定貴州東北部松桃縣與四川東南部秀山縣，作為將要開拓的傳教區，並且正式成立一個川黔傳教團，包括陶華勝夫婦、庫寶道姑娘（Janet Cuthbertson）、白宣思姑娘（Helen Clark）和康福南姑娘（Eliza Van Gunten）以及兩名中國傳道人、兩名售賣聖書人和兩名聖經婦女等共十一人。<sup>16</sup>

## （二）開拓松桃、秀山為傳教中心

宣道會傳教團自1923年11月1日開始，從常德啟程乘坐四艘船進入沅江的支流，前往川黔東部邊界區域。<sup>17</sup> 這一路上，庫寶道在日記詳細記載了三十多日路途中所見所聞及艱辛歷程，他們沿途的沅江、酉水支流，屬於武陵山區，地處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多數城鎮依山傍水，有漢族、土家、苗、侗等多元民族的聚居區，但是該地處閉塞，交通極為不便。尤其是沅江河流落差大，險灘居多，航道水深，他們的船隻一路上遭遇數次險情，才抵達湘西保靖。<sup>18</sup> 於11月22日，傳教團分為兩隊，一隊由陶華勝夫婦帶領傳道助手楊海欽、陳武熙、楊樹經和湯懋楠，前往秀山縣中和鎮。在12月4日抵達該地，租賃大西街譚伯詢住宅為臨時住

---

<sup>15</sup> H.V. Dyck, "Our Central China Mission,"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II, no.34 (20 October,1923): 575-77.

<sup>16</sup> "The Kweichow-Szechwan Mission Surveys and Launching a Beachhead," 4-5.

<sup>17</sup> E. Torvaldson, "Pioneer Efforts at Siu-shan, Szechuan,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X, no.3 (19 July,1924): 49.

<sup>18</sup> J.D. Cuthbertson, "Westward Ho! i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III, no.1 (1 March,1924): 7-8.

址對外佈道。<sup>19</sup> 另外一支傳教隊以女教士庫寶道、白宣思和康福南為主要人員，在12月初抵達松桃縣。進城前，她們被當地苗族武裝衛隊索取費用，因該地區頻發匪患。<sup>20</sup> 這兩地人口結構有所不同，秀山以漢人為主，松桃則以苗族為多數，約佔三分之二的人口。<sup>21</sup>

秀山的一位袍哥遺孀龔子瑛向陶華勝表示願意出售位於總爺垵側的房屋，宣道會於1924年3月就購買該處的佔2.4畝使用地，改建其中屋子為街頭的福音堂，其餘是兩棟四合院木屋，裏面共有二十餘個房間。在福音堂創立之初，本地官員多次試圖奪取教堂使用權，驅趕傳教人員離去，而傳教士把此案交給美國駐重慶領事館處理，地方官員才允准宣道會使用購置的房屋。<sup>22</sup> 相較而言，宣道會順利在松桃縣購置兩處房屋，一處是漢人教堂與傳教士及工人住處，另一處準備用於苗族教堂。<sup>23</sup>

宣道會在秀山與松桃的傳教活動，以差會注重的直接佈道為主要策略，在市集、鄉村、教堂處公開佈道。<sup>24</sup> 除了在本地佈道之外，亦積極將傳教範圍擴至川黔東部地區。<sup>25</sup> 起始階段，傳教士在秀山及附近地區呈現較為順遂的開拓及發展局面，陶華勝說到：

在四川黔省的這部分地區，我們將擁有相當大的一塊工場。從這裏坐船到龍潭、龔灘、彭水等地，這些縣鎮完全被傳教士忽略了。有些地方比秀山還大，在我到這裏以前，對這一帶還一無所知。上週日下午陶華勝太太在教堂召開學生聚會，有79人在場，

---

<sup>19</sup> Torvaldson, "Pioneer Efforts at Siu-shan, Szechuen, Central China," 49;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編：《秀山縣誌》（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597。

<sup>20</sup> "Pioneering in Kweichow Province,"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III, no.4 (22 March,1924): 55.

<sup>21</sup> "Annual Report: Central China Missio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923,"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III, no.4 (22 March,1924): 87.

<sup>22</sup> Torvaldson, "Pioneer Efforts at Siu-shan, Szechuen, Central China," 49.

<sup>23</sup> "The Kweichow-Szechwan Mission Surveys and Launching a Beachhead," 5.

<sup>24</sup> Torvaldson, "Pioneer Efforts at Siu-shan, Szechuen, Central China," 49.

<sup>25</sup> "Annual Report: Central China Missio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923," 87.



其中有 40 多人重複背誦上週的經句；昨晚有十多名婦女參加禱告會，有八名已經是慕道友，我們將在新年過後開始慕道班。我們與傳道助手一直在講道及佈道，所以幾乎所有人都嗓子疼痛。<sup>26</sup>

另外，在松桃地區，女教士的性別身分吸引本地女性對她們產生極大興趣。她們指出：「每天都透過小宿舍接待大批坦率的婦女。人們看起來非常友好，他們的清晰語言是我們的財富。」<sup>27</sup> 同時，她們與本地人建立互動的關係，帶來有良好的傳教效果：

這裏的情況很不安寧，搶劫和謀殺太頻繁了，我們的同胞需要祈禱，才能得到保護。值得高興的是，上帝真正打開了這些人的心。今天，一位可憐的老人願意奉獻 300 元。當我們沿着大街走的時候，每隔幾碼就有一次親切的問候，連士兵和平民不斷喊着「她們對我們有好處」。苗族人之所以歡迎我們，是因為我們不輕視他們。這裏的傷殘者總是感激不盡，大量傷者已經康復並來看望我們。最近有一些婦女和女孩來拜訪我們，他們希望來這裏學習，如何為寬恕和治愈祈禱，甚至有些人來參加清晨的祈禱，偶爾帶來他們可以召集的親戚和朋友。他們公開要求祈禱，有幾個人證明已經康復。一位年輕的女孩說到，上帝已經治愈了她嚴重的耳聾。女人們成羣結隊而來，有時我們發現很難有足夠的閒暇時間來吃飯，今日我們有幸教導三位年輕女子第一次祈禱。<sup>28</sup>

由上觀之，宣道會注重在佈道之餘，亦採取祈禱治愈疾病等宗教經驗，使得基督信仰在本地受人關注度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傳教士在

---

<sup>26</sup> "Central China Note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III, no.11(3 May,1924): 171.

<sup>27</sup> Cuthbertson, "Westward Ho! in China," 8.

<sup>28</sup> "Lettergrams from Far Frontier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X, no.20 (15 November,1924): 328.



日常佈道期間，所接觸松桃及附近地區的匪盜打、殺、搶時常頻發，而傳教士依舊持定「周圍的廣闊鄉村，對我們的使命提出嚴峻挑戰，人的需求也是巨大的。上帝會處理強盜的情況，這對我們信心也是一種挑戰，祂肯定能使強盜改邪歸正。」<sup>29</sup> 基於這種信心傳教的原則，艱難的環境非但沒有阻礙他們傳教的決定，更促使華中差會多次呼籲美國宣道會增援人手，來應付川黔龐大的傳教需求。



宣道會在川黔傳教區地圖<sup>30</sup>

### (三) 中西並舉：川黔地區的傳教發展模式

1924年是宣道會在川黔東陞的第二年，他們於松桃、秀山漸顯傳教成果。是年的復活節第一批慕道友受洗入教，松桃有十三人，秀山有十一人。<sup>31</sup> 同時，宣道會因應嚴謹的受洗制度，延遲了三十六人洗禮，

<sup>29</sup> M.C. Frehn, "Pioneering Perils and Prospect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 no.7 (14 February,1925): 104.

<sup>30</sup> "Kweichow and Szechwan,"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Kweichow-Szechuan Mission of the C&MA* (C&MA National Archives), 5.

<sup>31</sup> "Fruit Amid Difficultie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 no.35 (29 August,1925): 592; "First Fruit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 no.35 (29 August,1925): 592.

再經過觀察考核，才決定他們是否達到入教標準。由是觀之，傳教士不急於教會的人數增長，而更注重信徒道德生活的轉變，為了符合宣道會華中教區一貫的教會模式。<sup>32</sup> 隨着宣道會在秀山和松桃建立傳教中心，其佈道範圍逐漸擴大至縣區及至周圍鄉鎮。據 1926 年傳教士報告指出，「宣道會的福音傳播逐漸覆蓋了松桃縣一半面積，在二十一個不同的市集上佈道，而且在三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人們都可以看到我們的佈道。」<sup>33</sup>

除此之外，傳教士按照教區的自立政策，從設堂伊始便致力推動信徒注重自立理念。1925年松桃宣道會為實現「一個自給自足的教堂」，設立了教會的自養奉獻制度。這一年夏季，川黔地區遭逢大面積乾旱，導致五十年不遇的巨大饑荒，松桃大街小巷的人羣遊行焚香祭禮，灑水和舉旗祈求神明降雨，天空仍然猶如黃銅，絲毫未見雨滴，四處可見饑餓者的哀求聲與死亡的人。當一籌莫展之時，松桃縣長也寫信求助宣道會，為百姓祈禱天降大雨謀求生路。<sup>34</sup> 傳教士見此情形，即刻投入在松桃災區救濟窮人，組織基督徒婦女建立縫紉手工隊，將所得收益用作救助窮人。傳教士重視信徒參與社會救援，從而為傳播基督信仰在民眾間產生正面成效。<sup>35</sup>

西差會在1926年10月增派了蘇芳亭夫婦（Mr. and Mrs. E.F. Stewart）、高教士夫婦（Mr. and Mrs. Graham, J. Edgar）及白愛蘭小姐（Miss Ina K. Birkey），計劃進一步向川黔東陞地區擴展傳教活動。他們經過六十七天從湖南抵達川黔，卻逢國民革命軍北伐，各地頻發反基督

<sup>32</sup> "First Fruits," 592.

<sup>33</sup> "Tidings from Interior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 no.47 (20 November,1926): 761.

<sup>34</sup> E. Torvaldson, "Famine in Our Central China Mission Field,"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 no.2 (9 January,1926): 25-26.

<sup>35</sup> "The Kweichow-Szechwan Mission Surveys and Launching a Beachhead," 7.

教的事件，有教堂、教會學校、教會醫院被佔用、毀壞是屢見不鮮，以至於宣道會華中差會下令要求全體傳教士撤至上海。<sup>36</sup>

自1927年春季至1929年，在傳教士撤離川黔地區這一段期間，松桃與秀山宣道會皆由本地傳道助手與聖經婦女負責日常運作。<sup>37</sup> 在1927年12月宣道會傳教報告中述及：「在12月4日周日上午松桃宣道會禮拜出勤率為88人，21名男性，67名女性。女性教友和慕道友尤為熱心，她們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成長進步。1927年的聖誕節期間，約有350人聚集在教堂，基督徒捐款有32,250元，用於當地教會各項開支。」<sup>38</sup> 本地傳道人員在維持教堂教務之外，亦於鄉村佈道及家庭探訪頗具成效。比如松桃一位苗族基督徒老婦人身患重病，她的兒子執意要其重回膜拜民間神明，但老婦人和兒媳婦堅持拒絕，經過聖經婦女劉崇儉等人的家訪與祈禱，她竟不藥而愈，因她的虔誠信仰與見證，有不少慕道友重返教會生活。<sup>39</sup> 同時，松桃的聖經婦女與縣長夫人密切往來，使得當地的民教關係有實質改善。當傳教士撤離之後，松桃的一信徒企圖私佔宣道會教產，並誤導部分信徒，試圖私下出售福音堂和傳教士的房屋。然而，因着松桃縣長與本地人維護教產，令到福音堂及鄉村佈道所都免受搶掠。<sup>40</sup> 可見，傳教士不在場期間，教會得以延續運作與中國傳道人員投身有着密切相關。

傳教士自1929年復原之後，與歐陽復初夫婦、呂濟川、雷炳一等中國教牧人員，共同開拓新的傳教站，他們先後在川黔東部進行三次大規

---

<sup>36</sup> "Reinforcements arrive but soon Evacuate,"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Kweichow-Szechuan Mission of the C&MA* (C&MA National Archives), 18-19.

<sup>37</sup> A.C. Snead, "Interesting Day's in Eastern Land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I, no.22 (28 May,1927): 345.

<sup>38</sup> Helen Clark, "Women's Work at Sungtao,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II, no.20 (19 May,1928): 314.

<sup>39</sup> Clark, "Women's Work at Sungtao, Central China," 314.

<sup>40</sup> Rev. W. G. Davis, "Report of the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September 1926 to December 1927,"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1888-1934* (C&MA National Archives), 211.

模的考察及巡迴佈道。及至1932年宣道會在松桃和秀山附近的梅江、邑美、石耶司、長興堡、官莊等鄉鎮設立佈道所。另外，1931年宣道會委派傳教士進駐四川東南地區，由包忠傑夫婦（Mr. and Mrs. Paul Bartel）常駐酉陽縣龍潭鎮，並委任張叔明夫婦（Mr. and Mrs. William Chapman）在彭水縣漢葭鎮，以及庫寶道和白宣思到彭水縣鬱山鎮，這些皆為基督教尚未開拓的地區。<sup>41</sup> 翌年，雖然宣道會在彭水和龍潭租賃、購置房屋開設傳教站；<sup>42</sup> 但由於龍潭和彭水地處偏僻山區，民眾不多機會接觸外國人，普遍對傳教士抱持猜忌和疑慮。宣道會要取得發展，包忠傑直言須依賴本地信徒協助，否則是不會貿然開展傳教活動。<sup>43</sup> 故此，傳教士意識到宣道會要在邊陲之地發展，當務之急是培育出本地傳道人員。不過，宣道會為免濫竽充數，影響傳教質量，有着明確的培訓規定：「佈道隊的佈道員由教會選拔，由佈道員升為副宣教師，再升為宣教師；由神學院畢業后，擔任教會聖工者為宣教師，由宣教師遞升為牧師，牧師要經過舉行按手禮。」<sup>44</sup>

傳教士不只是看重中國傳道人員的訓練，也非常重視傳教團隊工作配合的默契度。1933年西差會推薦一對傳教士夫婦加入龍潭宣道會，最終卻因他們發生人事衝突，迫於無奈將其遣回母國。<sup>45</sup> 此後，宣道會為避免受到人事的負面影響，選擇差派訓練有素、豐富經驗的華中教牧人員到川黔地區，他們主要是宣道會武昌聖經學校的畢業生，由他們長期配合傳教士的工作成效頗豐。<sup>46</sup> 及至1934年10月，從宣道會秀山、

---

<sup>41</sup> "Key Occupation and Advance 1929-1935,"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Kweichow-Szechuan Mission of the C&MA* (C&MA National Archives), 20-21; 四川省宗教志辦公室編：《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書社，1992），頁174~176。

<sup>42</sup> "Mission Properties,"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Kweichow-Szechuan Mission of the C&MA* (C&MA National Archives), 157.

<sup>43</sup> 包忠傑著，何頌賢譯：《包忠傑自傳》（香港：宣道，2006），頁36~37。

<sup>44</sup> 四川省宗教志辦公室編：《四川基督教》，頁177。

<sup>45</sup>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38。

<sup>46</sup>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X, no.24 (15 June, 1935): 374.

松桃、龍潭、彭水傳教站的數據顯示，中國教牧人員與西教士已經人數相當，茲列表如下：

1934年宣道會在川黔傳教數據<sup>47</sup>

傳教站	佈道所	西教士	傳道人	聖經婦女	主日學	主日學 學生	教徒
4	7	12	8	5	7	324	188

可見，早期宣道會在川黔地區的發展，除了差會傳教士起到重要因素之外，更離不開本地傳道人員、聖經婦女的關鍵作用。因着他們與傳教士構成核心人員及平等關係，建立了宣道會重視福音佈道的行動經驗，從而更有助於推進教會本土化和自立目標。

### 三 漢苗邊陲社羣的傳教特徵

宣道會開闢川黔東陞的傳教演進，與其他基督教差會在中國邊疆路徑相似，實行點軸式傳教方略，由傳教站總堂作為中心，逐漸向四周佈道覆蓋，遂又形成一個個佈道所，不斷添設新的福音堂，如此旨在生生不已。<sup>48</sup> 除此之外，民國時期宣道會同樣也要應對地緣環境的挑戰，從而呈現出宣道會多個要項的顯著特徵。

#### (一) 基要信仰的身分認同

作為十九世紀海外傳教運動興起的宣道會，傳教士在川黔地區奉行基要保守派的傳教政策及神學信念，即是前千禧年論的堅定實踐者，相信滿足基督再來的基本條件，基督徒致力將福音傳遍未得之地。宣道會

<sup>47</sup> "Kweichow-Szechua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934*, 96.

<sup>48</sup> 徐永志：《融滲與衝突：清末民國間邊疆少數民族與基督宗教研究》（北京：民族，2003），頁83。

一向持定中國人亟需基督救贖的信念，重視派遣傳教士在基督復臨之前拯救異教徒是每個基督徒的責任。故此，宣道會傳教士在川黔地區的傳教活動充滿熱情，留給人一種緊迫感。在早期十餘年間，他們並未開設醫療診所、興辦學校等教會事業，而是孜孜不倦地從事直接佈道與牧養信徒靈性。<sup>49</sup>

除了日常外出佈道之外，每周傳教士及教牧人員於教堂開設慕道班、讀經班及主日學班課程及主日禮拜為重，以基本教義建立本地信徒對基督信仰的理解。如彭水福音堂的慕道班，從開始階段就吸引不少人參加，張叔明指出：「在剛開始的慕道班聚會期間，有二十四個男人希望加入這個課程。除了相信福音之外，大多數是要教他們閱讀漢字，因為當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文盲，我們也發現除非當他們成為基督徒，能以上帝的聖言為糧食，否則他們的信仰就不會堅定，也不會見證。」<sup>50</sup> 再則，傳教士受宣道會創始人宣信的影響甚大，他特別注重聖經是信徒生活最高準則，並且重視「基督救贖」、每日追求聖潔生活的「成聖」，接受耶穌是「醫治者」及相信祂的「再臨」，此四者構成的四重福音。<sup>51</sup> 因此，宣道會在川黔地區的教會，必須以四重福音為核心，進而塑造基督徒堅定、虔誠的信仰。亦因如此，宣道會設立教會制度有着嚴格的教規條例，規定信徒恪守如下內容：

- 1) 信主後，當戒烟、戒酒、戒毒、戒淫；
- 2) 實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凡基督徒傳教士不得與非基督徒通婚；結婚時在教堂或家中舉行婚禮，由教會牧師主持。
- 3) 結婚後不許離婚；
- 4) 婚、喪、喜事均按教會規定，舉行宗教儀式，不准搞燒香化紙等活動；

<sup>49</sup> H.M. Clark, "Trophies of Grace i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I, no.35 (27 August,1927): 568-69.

<sup>50</sup> A.G. Chapman, "A New Center for Gospel Witnessing,"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II, no. 35 (27 August,1932): 554.

<sup>51</sup> A.B. Simpson, *The Four-Fold Gospel* (New York: Christian Alliance, 1890).

- 5) 婚嫁、安葬、建造、出門、上學、開張等，不擇日期；
- 6) 教會中大人、小孩生病，應求醫服藥和祈禱，不衝讎、許願、贖魂、燒蛋等；
- 7) 凡違反教會規定，輕則勸告禱告認罪，嚴重者開除教籍。<sup>52</sup>

同時，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教義教規是他們行事為人的準則，宣道會以本地化的表述為「克己傳基本的福音」，要求本地基督徒表現悔改的憑證和聖潔的行為，如戒絕烟酒是謂「靈性上的克己」；遠道來參加禮拜，是謂「敬虔上的克己」；認捐收入十分之一，是謂「捐輸上的克己」。<sup>53</sup> 顯見傳教士注重邊陲社羣按照教義教規轉變道德生活，從神明信仰、話語表達、生活方式有歸信基督教的倫理依據，以此鞏固基督徒的信仰，讓本地人在識別、了解及接受基督信仰，以及增強教會的粘聚力都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對於川黔東陞的第一代基督徒而言，接受傳教士所傳福音，不僅是宗教信仰和生活價值觀的轉變，更是涉及改宗過程中，伴隨着經歷在羣體和生活環境的張力，遭遇挫折和苦難，付出人際、社會等成本。傳教士就指出：「在我們傳道工作中，所接觸的窮人比較多，然而我們其中也有一些聰明的慕道友，他們中少部分是來自尊貴的家庭，他們也願意為基督的緣故，一樣忍受被藐視和迫害。」<sup>54</sup> 為了應對現實的挑戰，傳教士們非常重視建立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堅定他們的基督信仰。

如1925年上海發生的五卅運動，隨着共產主義的推波助瀾，激起了國人反帝運動的浪潮，其時川黔地區的青年人亦受民族主義情緒的渲染。1926年1月份，川黔地區反帝國主義代表團，委派四名年輕女教師在松桃南城門口，高喊反帝國主義、反基督教的口號，勸阻路人不要進入

<sup>52</sup> 四川省宗教志辦公室編：《四川基督教》，頁177。

<sup>53</sup> 四川省宗教志辦公室編：《四川基督教》，頁178。

<sup>54</sup> Clark, "Trophies of Grace in China," 568.



外國人的教堂，指控西教士與帝國主義勾結，中國人信教也如此，威脅中國人繼續在教堂，將面臨巨大損失，並揚言將有人要殺害基督徒。一時間，城門口匯集大量的民眾，反帝國主義代表團攔阻黃老太太前往教堂，責令她作為信徒領袖，要公開燒毀聖經及放棄信仰。然而，黃老太太記起上個主日禮拜傳教士講道的內容，「我們應當順服上帝，不應當順服人」，以此她鼓勵在場的基督徒：「教會正在受到迫害，現在是我們認同信仰的時候了。我已經準備為主耶穌而死。古時，巴比倫的首領攻擊但以理，但神在他旁邊，塞住了獅子的口。所以我們若順服神，就沒有理由害怕。」她的話音剛落，福音堂的信徒紛紛表示贊同。謝太太向代表團表示：「你們能說服我放棄那個把我從鴉片和賭博的詛咒中拯救出來的神嗎？」緊接着，在場的曹老太太直言不諱：「你可以把我帶到刑場去，但這不會動搖我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同樣，一位剛來教會不久的慕道友對代表團說：「為何你們對外國人小題大做？我們當地學校的老師懂英文而得到更高的報酬，如果沒有煤油燈、縫紉機，我們很多人能做甚麼？」另外有信徒強調：「讓我們先忠於神的國，然後再忠於我們自己國家的公民身分。」眼見在場的教徒堅持不從的態度，周圍的非基督徒也拍手叫絕，最終令代表團悻悻而去。<sup>55</sup> 這一時期，宣道會通過祈禱和見證等聚會，讓本地基督徒羣體彼此分享，在反基督教考驗中堅固信仰立場。<sup>56</sup> 雖然宣道會作為外來宗教信仰，並沒有在異質地域中被同化，亦不同於務實求存、祈求無災無病的民俗形式，卻是注重建立本地基督徒的界限意識，在現實利益與威脅迫害之下持守信仰，這不獨令非基督徒大感詫異，亦出乎反基督教者的意料之外。

處於川黔東陸地區，宣道會也備受本地政治權力干預的困擾，這也是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面對的一種信仰張力。1929年初川黔東部多數縣城被軍閥周西城率領的軍隊佔駐，當時周西城與蔣介石矛盾激化，周氏聯

<sup>55</sup> H.M. Clark, "Women of China Whose Names Are in the Book of Life," (2 January,1926): 10.

<sup>56</sup> E.F. Stewart, "Our Kweichow-Szechwan Field in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 no. 36 (6 September,1930): 583.

合軍事力量反蔣反美。秀山縣被軍閥駐守管理後，下令要徵用秀山宣道會福音堂的座椅、風琴等物品，用於市場的公眾娛樂活動。對此，傳教士表示拒絕，告知教堂物品給軍方使用是不符合宣道會的作法，而贈送一幅《浪子回頭》油畫給官府。翌日，縣長帶着一隊士兵到教堂，強行奪走教堂的物品。未幾，全城張貼滿反《福音書》、反帝國主義的宣傳，在教堂圍牆也隨處可見。原來這場市集娛樂演出，有一幕就是嘲諷外國人的戲分，教堂的座椅、燈、風琴和餐具櫃用於裝飾洋人住所，起到宣傳反基督教的效果。<sup>57</sup> 不出多時，秀山傳教站就被士兵強行霸占，教牧人員出入教堂，時常遭到士兵吐唾沫羞辱及毆打，他們也恐嚇信徒禁止入內。儘管如此，傳教士與中國教牧仍然表現出佈道熱情，與他們談論基督信仰。<sup>58</sup> 無獨有偶，宣道會松桃傳教站也被軍閥佔領，以致中斷了教堂活動，而教牧人員則以外出家庭探訪，露天公開聚會，街頭佈道等方式為主。<sup>59</sup>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軍閥撤離松桃和秀山，宣道會的大部分基督徒在考驗中非但沒有離開教會，反而人數逐漸增加。傳教士體認到，基督徒透過在艱難處境中對基本信仰的認信，效法「基督受苦」的見證，進而形成了基督徒身分認同的羣體行為，社會羣眾改變對基督教的想法。<sup>60</sup>

## (二) 治愈邊緣鴉片者的策略

自清末到民國鴉片風在中國蔓延，中國官方多次頒諭規管、查禁進口及國內種植與吸食，但一直在全國未見積極成效，在一些邊緣地區

---

<sup>57</sup>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 no. 32 (9 August, 1930): 516.

<sup>58</sup> E.F. Stewart, "Our Kweichow-Szechwan Field in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 no. 36 (6 September, 1930): 583.

<sup>59</sup> "Rev. William Carlaw Chapman Siu-shan,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 no. 38 (20 September, 1930): 644.

<sup>60</sup>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I, no. 6 (7 February, 1931): 88.

種植、吸食鴉片仍呈盛行之勢。<sup>61</sup> 職是之故，西方傳教士在華禁煙事工如影之隨形，一方面於報章撰文，揭露煙患實況、駁斥護煙謬論；另一方面則成立戒煙所，結合佈道、勸說、醫療治療、強制手段助人戒除煙癮。<sup>62</sup> 論到戒除鴉片運動，基督教從社會現實面向，皆會指出鴉片的弊端害處，而他們會採取不同措施與策略。一直以來，宣道會主張不開設備醫療事業，當他們面對川黔地區鴉片氾濫的情況，所採取祛除此弊端的措施，意味着是邊緣處境中的傳教特徵之一。

早期宣道會在川黔傳教報告時常寫道，本地人歸信基督教的原因，多半與他們戒除吸食鴉片相關。由於民國川黔東陲處於政治邊緣，本地軍閥和官員以銷售鴉片獲得金錢利益的鼓動下，普遍民眾公開種植罌粟。<sup>63</sup> 譬如三十年代宣道會之所以選擇在龍潭鎮開設傳教站，起因是傳教士看到這裏的民眾長期陷入吸鴉片的惡習，從而迫切希冀帶給他們福音救贖。當時包忠傑就記述到：

許多人由於吸食鴉片的習慣而墮落，這是表明一個傳教先驅者領域的證據。龍潭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吸食鴉片。每個人進家門都會看到一盒或多套鴉片煙盒。隨處可見的人是蒼白憔悴，與其說是真實的人，不如說是幽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吞吐這種消耗他們健康、金錢和幸福的毒物。<sup>64</sup>

---

<sup>61</sup> 傅建成：《百年瘟疫——煙毒問題與中國社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2000）；龔纓晏：《鴉片的傳播與對華鴉片貿易》（北京：東方，1999）。

<sup>62</sup> 鄭智良：《病、魔、藥——「清末時新小說」（1985）中的基督教治弊論述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哲學博士論文，2017），頁61；劉天路編：《身體·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研究》（上海：上海人民，2010），頁167~181。

<sup>63</sup> "Annual Report: Central China Missio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923,"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VIII, no.4 (22 March,1924): 88; P.H. Bartel, "Westward Ho! En Route to Szechuan,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II, no. 14 (2 April,1932): 217.

<sup>64</sup> P.H. Bartel, "Pioneering in Szechua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II, no. 53 (31 December,1932): 850-51.

顯而易見，本地不分男女老幼抽鴉片的習慣，使得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窮困潦倒，精神萎靡。因此，在龍潭傳教站設立伊始，即包忠傑夫婦與歐陽復初、呂濟川等教牧人員，致力宣傳吸食鴉片為惡習，試圖清除流弊，呼籲人改信基督教才是戒除鴉片癮的方法。<sup>65</sup> 同時，傳教士在彭水地區，也看到吸食鴉片者處境十分艱難，發病率非常高，人們又無法擺脫鴉片癮，故而他們也是積極勸告、協助人棄絕吸鴉片。張叔明記述了一個戒除鴉片癮的例子：

務川的一位張太太不是基督徒，但一直對福音保持興趣，她的丈夫在彭水擔任官職。有一次，她問是否可以與我們一起航行。當我們得知她是一名鴉片煙民時，並與聖經婦女一起探訪她。但我們表示不希望她在福音船上抽鴉片。自我們離開務川那一天，上帝如此慷慨地答應她，並在祈禱的路上，完全放棄鴉片且轉向主。當她到達彭水後，她的丈夫和朋友非常驚訝她身上發生的種種奇妙變化。自那以後，她和朋友來問我們，為她提供了甚麼藥物來治愈的煙癮。我們說耶穌基督是一個能夠拯救人最徹底的救主。<sup>66</sup>

由上可見，針對本地鴉片烟民，傳教士竭力勸他們入教，以依賴祈禱上帝的宗教經驗，來幫助戒除鴉片癮。<sup>67</sup> 在現實生活中，吸食鴉片者固要承擔身體惡果，傳教士們在鄉村巡迴佈道，時常遇到民眾的求助，為其家人戒除鴉片癮。然而，他們不僅處於貧病交加的境地，生活也充斥着不良習慣，以致歸信動機不是單一。包忠傑直言道：「吸食鴉片這種習慣使人道德敗壞、思想墮落，遠遠超過普通頑固不化的人，以致於吸鴉片者很難真誠地尋求上帝。」<sup>68</sup>

<sup>65</sup> Bartel, "Pioneering in Szechuan, China," 851.

<sup>66</sup> Chapman, "A New Center for Gospel Witnessing," 554.

<sup>67</sup> 四川省宗教志辦公室編：《四川基督教》，頁177。

<sup>68</sup> P.H. Bartel, "Sunshine and Cloud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X, no.20 (18 May, 1935): 313-14.

為了解決這類問題，宣道會的福音堂專門設有戒除鴉片的房間，規定不隨便收容他人，欲戒鴉片者必須是慕道友的身分。<sup>69</sup> 儘管在宣道會的一般教義層面，人死後下地獄是未認信耶穌為救主，而不是吸食鴉片；不過傳教士會特意強調吸鴉片者，是被基督信仰定罪，必然受到上帝審判以作勸誡。對於治療鴉片癮是沒有甚麼特效藥的，故宣道會主張宗教革新禁吸鴉片的措施，不採用藥物治療，認為心癮才是癥結，身體煙癮主要以學習聖經課程，依靠上帝力量，才有新造的心，再結合佈道、勸說、強制在封閉場所等手段助人戒煙，起到在精神和身體的治療作用。<sup>70</sup> 按照這種戒煙的方法，傳教報告指出：「彭水的西部，許多吸食鴉片的婦女已經被送去教堂，並定期接受教育，為她們祈禱能真正重生，並信靠上帝，身體和精神都得到健康。」<sup>71</sup> 因此，慕道友戒煙的同時，亦建立了基督徒生活，因為每周都參加教會聚會、禮拜而產生身體和心靈的變化。

按照宣道會基督信仰具有剋己自律、移風易俗的作用，讓慕道友在福音堂戒除鴉片後的受洗儀式，表明改宗基督教並焚燒家中的偶像，繼而他們熱衷於傳播信教戒煙的有效方法，遂有人紛紛要求入教戒烟，舊俗隨之在教友的親人朋友羣體逐漸被抑制。<sup>72</sup> 如松桃的婦女見韓夫人在福音堂戒除鴉片，因基督信仰發生巨大改變，於是也仿效她手持聖經在固定時間去福音堂聚會。<sup>73</sup> 亦因如此，宣道會川黔地區的熱心信徒，多半原是吸鴉片者，日後不乏有人成為傳道助手，從事佈道與宣傳戒除

---

<sup>69</sup>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IX, no.14 (7 April, 1934): 216.

<sup>70</sup> Janet D. Cuthbertson, "A Door Swings Open,"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XI, no.45 (7 November, 1936): 716-18.

<sup>71</sup> "Department of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III, no. 21 (27 May, 1933): 330.

<sup>72</sup> Clark, "Women of China Whose Names Are in the Book of Life," 7, 10; "Our Foreign Mail Bag," 216.

<sup>73</sup> Clark, "Women of China Whose Names Are in the Book of Life," 10.

鴉片的工作。<sup>74</sup> 職是之故，宣道會福音堂依照聖經教導及宗教聚會來指示生活，對川黔東陞社會的邊緣鴉片羣體有較大影響力，從而為基督教在本地樹立良好的社會印象，這種社會印象對推動傳教活動頗有益處。

### (三) 宣道會在邊緣苗族的傳教

宣道會在川黔地區的苗民族羣的傳教活動，相較其他差會在西南苗族工作要晚許多年。自清末民初經循道公會與內地會深耕苗民教會數十年頗具成效，苗族社羣曾以羣眾運動的規模改宗基督教，主要是傳教士興辦教育，優先於漢族社羣，從而在苗族建立俱佳的社會印象。<sup>75</sup> 尤其是循道公會藉着教育、醫療等事業，宛如苗民族羣的救星。<sup>76</sup> 為此，在二十年代國民政府數次對西南地區多元民族進行調查，威寧石門坎基督教就深受當局政府的重視，他們關注教會通過教育工作、創製苗族文字，如何改變苗族貧窮落後的形象。<sup>77</sup> 然而，同樣是社會邊陲羣體的川黔苗族，卻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重視，甚至未見當時中國基督教對該區有深入的調查報告，與雲貴等地苗族有非常大分別，這也表明了川黔東部的苗族羣體未得到傳教團體的關注。

宣道會在川黔數次的實地調查中，特別注意到松桃、彭水等山地的苗族居住區。在地域語言方面，松桃苗族與貴州的銅仁、四川的西陽、秀山和彭水等地區苗族同為川黔東部苗語方言系區。<sup>78</sup> 川黔東部苗語系

<sup>74</sup> Clark, "A Sheaf of Testimonies from Central China," 222.

<sup>75</sup> 中華續行委辦調查特委員編：《(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修訂))》，頁718。

<sup>76</sup> 張坦：《「窄門」前的石門坎——基督教文化與川滇黔便苗族社會》（貴陽：貴州大學，2009）。

<sup>77</sup> 胡清心：《伯格理（Samuel Pollard）在滇黔川地區的傳教思想與實踐（1887-1915）》（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哲學博士論文，2019），頁5~6。

<sup>78</sup> 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松桃苗族自治縣志》（貴陽：貴州人民，1996），頁134。



與湘西苗族方言、川黔滇苗族方言構成西南地區三個不同苗族羣體的主要語言。<sup>79</sup> 在文化上層面，川黔東陞的苗族是缺乏文字的羣體，交流靠口耳相傳；在地理與政治來看，也是處於邊緣性，苗民被視為貧窮、落後和疾病的象徵，既無多數土地亦無政治權力，而多數人為求生存，走向盜匪之路。川黔東部的苗民生活習俗不同於漢人，民風彪悍逞勇，輕生好斗的性格，發生衝突、挑釁就以暴力解決。<sup>80</sup> 其時在松桃縣苗族傳教的鄭哲克（Edgar Truax）就觀察到，<sup>81</sup> 許多苗寨的青年人，選擇數年的強盜生活，組織隊伍搶掠其他苗寨，導致松桃縣的六十個苗寨頻發搶劫、燒毀的村落場景，從而引起了宣道會對苗族羣體開展福音的責任感。<sup>82</sup>

宣道會委派鄭哲克夫婦與庫寶道、白宣思等人在1925年初，進入松桃苗族地區，定期開展巡迴佈道。每逢苗族地區的周五集市日，會聚了附近村寨的苗民，傳教士利用苗族集市機會佈道。<sup>83</sup> 儘管苗寨匪患猖獗嚴重，而傳教士仍定期在市集租用一張小桌子，陳列福音書籍，向路人宣講「罪惡與審判」等基督教教義。苗民見傳教士不懼匪患出入苗寨傳教，深感驚訝，並引起他們的興趣購買福音書，繼而解答各種疑問。隨着走村串戶，逢人佈道，宣道會逐漸打開苗寨的工作。<sup>84</sup>

---

<sup>79</sup> 湘西、黔東兩個方言內部差別較小，有土語的區別。川黔滇方言內部差別較大，又分川黔滇、滇東北、貴陽、惠水、麻山、羅泊河、重安江等七個方言。大多數次方言內部還有土語的區別。循道公會的傳教士柏格理所在大花苗族羣隸屬滇東北方言。參王輔世：《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苗語簡志》（北京：民族，1985），頁3。

<sup>80</sup> M.H. Tien, "The Unfinished Task in Kweichow-Szechwan,"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Kweichow-Szechuan Mission of the C&MA* (C&MA National Archives), 185.

<sup>81</sup> 鄭哲克是美國獨立傳教士，於1919年到湘西鳳凰苗寨區，擇地建居住點佈道，始終未見成效。於1925年鄭哲克夫婦加入宣道會。

<sup>82</sup> Edgar Truax, "Wait Thou Only on the Lord,"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C&MA in China Biographical Materials Volume Two* (C&MA National Archives): 62-66.

<sup>83</sup> Truax, "Wait Thou Only on the Lord," 65-66.

<sup>84</sup> Truax, "Wait Thou Only on the Lord," 68.



翌年，宣道會在松桃縣苗寨區的長興堡、安堂坡開設福音堂。他們開辦主日學、慕道班與聖經班，對苗民的改宗有着重要作用。<sup>85</sup> 在傳教報告中記敘了其中一例成果：

一個苗族的家庭婦女，從小就學會漢語，後來嫁給一個苦力。在松桃慕道班，她成為一名熱心信仰的人。她原來脾氣暴躁，可是一想起這種事，她就傷心落淚，祈求上帝寬恕。她會認真地對兩個小女兒說：「你們的母親相信主耶穌，並正學習祂，你們必須信任祂。」她走到哪裏都帶着教理問答手冊，利用每個空閒時間學習，並徵求大家的幫助。當她丈夫決定搬到另一城鎮時，那裏的傳教士給我們傳來很好消息，她一家都成為事奉者，父母也成為教會的受洗成員。<sup>86</sup>

另外，宣道會在苗族的生活環境中，特別重視苗民從原宗教與習俗行為的轉變，要求遵守宣道會的教規，如拆毀偶像、禁止巫術、離棄盜匪的生活、維持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等。<sup>87</sup> 松桃南部的一個苗族大村落，兩個婦女首先在傳教士佈道下受洗信教，其時正逢苗民舉行祭祀龍神大型節日，以祭神確保收成，抵禦災難。<sup>88</sup> 兩位苗族基督徒婦女因應遵守基督信仰準則，拒絕捐錢祭祀，被族人嚴以警告將來發生任何災難，都由她們承擔責任。因此，她們時常遭到苗民婦女的排斥、詆毀，如有人砍下樹木，故留斑痣，謠傳龍神憤怒，以致民眾恐懼，極大排斥基督徒。在宗教觀念和現實利益衝突下，她們的不安全感大為增加，便求助於宣道會，希望憑藉依靠傳教士為護符，得到地方官員的政治保

<sup>85</sup> "Rev. E.V. Truax, Taped April 12, 1962,"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C&MA in China Biographical Materials Volume Two* (C&MA National Archives), 112.

<sup>86</sup> Clark, "Trophies of Grace in China," 568.

<sup>87</sup> Truax, "Wait Thou Only on the Lord," 79-81.

<sup>88</sup> 祭祀龍神又稱為「接龍」，是松桃苗族中的一種羣眾性祭祀活動，也有獨自自辦。人們根據某種跡象，其地龍神將要外遷，怕失去其保護憑依，遂聯合起來，用祭祀的方法，表示眾心挽留誠意。祀品為雞、豬各一隻，時間為一天。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松桃苗族自治縣志》，頁146。

護。然而，傳教士拒絕依賴政治保護的作法，強調基督徒理應祈禱上帝的信仰立場。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基督徒仍受到苗族社羣的排擠和欺凌。其中一個婦女的十歲兒子因身患重病，寨裏的人不斷責罵、嘲諷是她信奉基督教導致神明發怒的結果。見此，鄭哲克等人前去探訪，為生命危在旦夕的孩子抹油祈禱，以耶穌的名責令疾病離開，男孩竟立即不藥而愈，轉危為安。這件事在當地引起極大關注，此後苗民不再有人公開攻擊這位基督徒婦女。在苗民的宗教意識中，上帝和形形色色的眾神鬼道不同，在宗教競爭下的基督教更具有力量。<sup>89</sup>

宣道會在苗族地區傳播開後，僅憑着少數西教士及中國教牧已不能適應本地發展需求。亦如川黔的以往工作，宣道會重視培育本地苗民教徒骨幹，承擔同族人的福音工作。田初路夫婦是松桃早期歸信的苗民信徒，1925年田初路病重，偶然因讀到福音書，產生信仰基督的興趣，隨後邀請傳教士家訪，為其病情祈禱就得痊愈，於1926年聖誕節受洗，積極熱心佈道。在鄭哲克悉心栽培下，田初路夫婦成為得力助手。儘管在北伐期間，福音堂的聚會一度停止，田氏夫婦仍然堅守在家庭的信仰聚會。<sup>90</sup>數年間，田初路已經是苗族福音堂的傳道人員。不料在1936年土匪搶掠苗寨時，田初路與三名苗族信徒被殘忍殺害，這對苗族教會造成巨大損失。此後，田師母與傳教士共同再培育苗民信徒龍先生，由他擔任苗族教會的教牧工作。<sup>91</sup>與此同時，鄭哲克主持一項《英苗字典》翻譯工作，是以英文字母轉為常用苗文，他與來自長坪鄉石家寨苗民傳道助手石清泉共同編寫及翻譯。可惜的是，他們多次被土匪搶劫，導致這

---

<sup>89</sup> Edgar Truax, "Wait Thou Only on the Lord,"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C&MA in China Biographical Materials Volume Two* (C&MA National Archives), 85-86.

<sup>90</sup> E.A. Truax, "Among the Miaos of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V, no.34 (24 August, 1929): 571-76; Clark, "A Sheaf of Testimonies from Central China," 220.

<sup>91</sup> Paul. Bartel, "Strengthening the Churche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XI, no.14 (4 April, 1936): 217; R.J. Birkey, "Perils, Progress, and Praise,"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XI, no.22 (30 May, 1936): 349-50.

批手稿佚失，最終該項翻譯計劃被迫中斷。<sup>92</sup> 從此來看，苗族社會的暴力危機，造成宣道會苗族教會有不少變數，這也是當時教會欲發展面對的挑戰。

經過宣道會苦心耕耘苗族教會至三十年代，多數教牧人員不是被嚴重疾病擊倒，就是在土匪、鬥爭暴力中被殺害。<sup>93</sup> 如1934年長興堡的苗族教會，經歷土匪入侵搶掠，有二十餘名年輕信徒被屠殺，為此鄭哲克極為悲傷地述道：「正當他們變得能夠見證和傳教時，卻被土匪殺害了，我們在這裏度過了非常艱難的歲月。」<sup>94</sup> 另外，宣道會在苗族婦女的工作，卻因鄭哲克牧師母（Prudence R. Cooley）突然去世，帶來巨大的損失。鄭師母自1925年到松桃苗族羣，以主持婦女聚會、慕道班為主，她與苗族婦女有着深厚的感情。1930年6月24日，鄭師母生產第四個孩子後的三天逝世。她在彌留之際，仍掛念着為苗族培育本地傳道人。<sup>95</sup> 翌年，鄭哲克和女教士巴致道（Lucy Ballard）結婚，他們返回川黔地區，於松桃、龍潭的苗族繼續未竟之業。<sup>96</sup>

無疑，早期十餘年宣道會在苗族的傳教經驗，主要因着地緣複雜性，無論對教牧人員個人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抑或是苗族基督徒在社會衝突中導致人口流離，都對苗族教會整體的發展有所限制。儘管如此，宣道會仍然致力於苗族邊緣性的傳教活動，兌現着他們一向以來抱持未得之地傳教的特殊性。

---

<sup>92</sup> "The Kweichow-Szechwan Mission Surveys and Launching a Beachhead," 5; 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松桃苗族自治縣志》，頁135。

<sup>93</sup> P.H. Bartel, "Edgar. A. Truax, Apostle to the Miao,"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C&MA in China Biographical Materials Volume Two* (C&MA National Archives), 95-96.

<sup>94</sup> "Rev. E.V. Truax, Taped April 12, 1962," 110.

<sup>95</sup> "The Home-Going of Mrs. Truax of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 no. 38 (20 September, 1930): 612, 616.

<sup>96</sup> Bartel, "Edgar. A. Truax, Apostle to the Miao," 95-96.

## 四 邊緣處境的危機及其應對

民國時期的川黔東陞的邊緣性現象，除了呈現土匪人數多、分布廣、禍患大之外，再加上軍閥混戰的散兵、盜匪與袍哥等因素合力所致，構成該地區傳教士的日常工作受到威脅。<sup>97</sup> 同時，也有來自中國共產黨嵌入川黔地區的紅軍勢力，使這一區域一度陷入暴力的洪流中。因此，宣道會在川黔區域的開拓，無法避免橫行鄉里、搶劫商旅、亡命橫行種種匪患以及中共紅軍在本地武裝革命的威脅。從早期宣道會在川黔邊陲遭遇搶劫和綁架案例來看，既可窺見基督教採取應對措施的行動經驗。

### (一) 案例敘事一：

#### 傳教活動中被搶劫綁架的日常處境

民國時期川黔東部交匯邊陲頻發暴力搶劫是許多貧民的謀生手段。他們根據組織實力大小，採取入室搶劫、攔路搶劫、船隻搶劫。<sup>98</sup> 早期宣道會委派傳教隊前往川黔的旅途會雇用本地護送隊。傳教士很快就發現，護送隊沒有統一編制的鬆散組織，只要能拉上十餘人以上的隊伍，就可以打上護送隊的旗號，在護送途中抬價勒索，是變相的搶劫方式。有一次傳教隊不從護送隊強行抬價，導致傳道人員被打傷，此後就決定不再雇用護送隊。<sup>99</sup> 為此，傳教士外出鄉村佈道，有數次遭遇到土匪攔路搶劫。如1926年，庫寶道姑娘等人外出佈道，途經河岸遭遇一羣戰敗後的軍閥士兵與本地土匪，結果佈道隊一連七次被攔路搶劫。遠在美國的母親得知消息后，力勸庫寶道離開危險的川黔地區，卻又見庫寶道

---

<sup>97</sup> 從1911年到1935年，四川境內大大小小的軍閥混戰達400余次，老百姓被禍之慘烈，甲於全國。土匪猖獗亦不亞於貴州。直到民國時期，川黔邊界地區正是中國土匪活動延綿不絕的傳統所在地。參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北京：中國人民，1995），頁218；內思飛著，徐有威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2010），頁30。

<sup>98</sup> "Fruit Amid Difficulties,"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 no.35 (29 August,1925): 592.

<sup>99</sup> "Reinforcements arrive but soon Evacuate," 6-26.

堅韌決心，便繼續支持她在川黔傳教工作。<sup>100</sup> 無獨有偶，鄭哲克與傳道助手曾經在佈道旅途中，一天之內遇到兩支土匪隊的搶劫，首次就被搜刮一空，之後的第二批土匪見沒有財物，則把鄭哲克打成重傷，之後他幸得信徒的幫助，治療恢復健康。此外，鄭哲克還歷經八次被土匪搶劫財物，其中一次是被綁票勒贖。<sup>101</sup>

鄭哲克和宣登岸(Harry Schwendener)兩位傳教士在1929年4月22日，開始了川黔東部實地考察之旅。他們計劃從松桃至西部縣區，為期兩個月的時期，覆蓋超過一千英里的距離，所攜帶的大部分物品是福音書籍。當他們途經怒溪鎮的山路，突然出現匪徒三人，用槍械威脅他們進到一山谷後，搶奪幾乎所有的金錢與物品。他們被放行不久，再度被另一個土匪攔截，搜刮一番將宣登岸的婚戒和鄭哲克的鋼筆掠走，並押着他們到怒溪城，這時傳教士得知綁架者是當地民兵。走了一夜之後，他們被關在四川邊界山區的洞穴，有五個持槍的人看守，並索要兩萬銀元才可放人。儘管傳教士多次說明他們沒有錢，但土匪不相信，認為只是壓低贖價的伎倆。在山洞的第五天深夜，眼見看守的人睡熟，他們乘機逃脫，當抵洞口的斜坡時，宣登岸卻意外滑跌，鬆散石頭落到洞穴深處，被驚醒的土匪立即將兩人抓捕，他們全身被緊捆，鄭哲克身上多處打上死結，導致他身體麻痺，留下後遺症。翌日，土匪商議後提出六百六十元的贖價，將宣登岸扣留，放行鄭哲克回去籌錢贖人。松桃的王縣長與宣道會討論，不可交贖金，否則傳教士每逢出城門，就會不斷有人來抓他們，勒索更多的錢。王縣長發電報給怒溪鎮的民兵首領，若是宣登岸發生任何事情，將處決怒溪鎮一百人為代價。這一時期，宣登岸被土匪轉移到多地，他每在一處有機會就向土匪傳福音。然而，王縣長與土匪談判無果，他建議鄭哲克籌集贖金，一旦宣登岸被釋放，他會立即率士兵剿滅土匪。五月七日，兩個青年人攜帶贖金前去交換人質，他們行到松桃城外五英里的地方，遇到

<sup>100</sup> "Mrs. George Cuthbertson,"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II, no.17 (28 April, 1928): 270, 272.

<sup>101</sup> Truax, "Wait Thou Only on the Lord," 71-72.

了進城的宣登岸。原來土匪得聞秀山縣被松桃的士兵接管，察覺將被清繳的危險，立即釋放了宣登岸。<sup>102</sup>是次事件以後，鄭哲克和宣登岸在漢口休養數月，再度重返川黔工場。<sup>103</sup>

顯然易見，傳教士自進入川黔東陞地區之日起，不會因外國人的身分，可以運用豁免危險的權力，反而他們的傳教活動比大部分華中教區顯得更為艱困，因應開拓、福音佈道的工作性質，無法避免高危風險。可以說，宣道會主張的「未得之地」與被搶劫等惡劣地緣環境是緊密相連的。這些傳教的經歷充分說明了宣道會的犧牲精神和傳福音拯救靈魂的決心，即使傳教士遭到盜匪搶劫，他們始終抱持將基督信仰傳給當地人的信念。<sup>104</sup>如果說這種在「未得之地」的行動經驗，對於宣道會的信仰識別是至關重要，也就不難理解包忠傑牧師多年在龍潭的艱難環境中沒有退卻，反而更是加強他傳播福音的迫切感，「這個地區多年一直是強盜橫行的地區，現在某種程度上，通過軍隊的幫助稍微安全一些，我們是多麼渴望繼續傳福音給他們。」<sup>105</sup>可見，早期宣道會之所以在川黔地區生根發展，沒有因為外部環境而削弱，表明對本地族羣有強烈救贖意識的身分認同，從而呈現出宣道會在邊陲區域性的差會特徵。

## (二) 案例敘事二：

### 傳教士被紅軍俘虜及宣道會的應對

民國時期在華傳教士羣體對中國共產黨的印象，大多是有激進主義及其恐怖暴力的形象。有學者研究指出，早期中國共產黨視基督教為一

---

<sup>102</sup> Rev. E.A. Truax and Rev. H. Schwendener, "In the Hands of Robbers in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V, no.34 (24 August, 1929): 552-55; Truax, "Wait Thou Only on the Lord," 72-78.

<sup>103</sup> Truax and Schwendener, "In the Hands of Robbers in Central China," 555.

<sup>104</sup>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X, no.24 (15 June, 1935): 374.

<sup>105</sup> P.H. Bartel, "The Outlook at Lungtan, Central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VIX, no.10 (10 March, 1934): 154.



個重要威脅的競爭對手，傳教士基本認定共產主義應為排外和反教負責的相同取向。<sup>106</sup> 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暴力革命手段，來自於他們在傳教活動的普遍集體記憶。<sup>107</sup> 自三十年代中共紅軍轉向四川等西南地區，在川黔的基督教對中共革命行徑也就有更具體的了解。

活躍於湘鄂區的紅三軍，在1931年開始遭到國民黨集中兵力的圍剿，不得不退出洪湖，轉到湘鄂川黔交界山區開展游擊戰爭，之後湘鄂西中共分局在黔東建立新蘇區。<sup>108</sup> 自1933年12月至1934年10月期間，賀龍率領紅三軍在川黔東部建立包含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及四川西陽、秀山等革命根據地。<sup>109</sup> 他們一方面向農民羣體宣傳共產主義的思想，另一方面則採取暴力的方式搶劫和俘虜鄉紳、地主和商人，向他們勒索贖金。作為一個極不穩定的革命黨組織，中共在面對剿滅的嚴酷形勢下，暴力便是他們生存的手段之一。<sup>110</sup> 自紅軍進入四川地區以後，人們對共產黨的恐懼印象如洪水猛獸，紛紛逃亡亦是普遍的現象。<sup>111</sup> 而位於通訊設備不便的川黔東陞地區，在紅軍迅速的軍事行動中，許多民眾來不及避難，導致時常陷入險境。1934年5月8日，川東彭水縣城的駐防軍約有五百名士兵，清晨離城去他地。當日紅三軍的三百多士兵在無任何抵抗下，即刻佔領整座彭水城。此時宣道會彭水傳教站的日常工作由

---

<sup>106</sup> B.S. Greenawalt, *Missionary Intellig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Protestant Report, 1930-195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NC, Ph.D. Thesis, 1974); M. L. Thornber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 Study of Views Expressed by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aries 1921-1941* (Boston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74); 楊衛華：《十字架下的馬克思——基督教話語中的共產主義及中國實踐》（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11）；陳智衡：《紅火淬煉——近代中國基督教政教關係史》（香港：建道神學院，2016）。

<sup>107</sup> William Christie, "How God Delivered Some Chinese Confessors of the Faith,"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V, no.15 (13 April, 1929): 233.

<sup>108</sup> 蔡覃：《紅軍在黔東蘇區的活動研究》（貴州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7），頁16~17。

<sup>109</sup> 湖南湖北四川貴州省檔案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匯集（1934-1936）》（長沙：湖南人民，1987），頁95。

<sup>110</sup> Ray H.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Martin Ekvalls and Howard Smiths, 1892-2013* (Printer: King Printing Company, 2013), 51.

<sup>111</sup> 〈四川難民的呼籲〉，《興華報》32卷第1冊（1935年1月16日），頁3。



斯近信牧師夫婦（Rev. & Mrs. Howard A. Smith）負責。<sup>112</sup> 當斯近信驚聞紅軍入城的消息，欲協妻兒逃離已為時已晚了。紅三軍很快將宣道會福音堂洗劫一空，並抓走斯近信一家作俘虜，離城往黔東地區。在斯近信多次的請求下，紅軍釋放其妻兒，要他寫贖金信，索要三萬美元與價值三千五百美元的藥物才可以釋放斯近信。而後紅三軍安排代表人員與斯師母一同前往武昌宣道會索取贖金。<sup>113</sup>

實際上，這一時期各蘇維埃根據地中共領導人非常看重他們抓獲的「洋票」。在1930年就有25位在華傳教士被中共軍隊扣押，沒收了他們的私人和教會財產。<sup>114</sup> 研究早期中共與教會關係史的學者指出，中共在武裝革命地區的基督教皆受到衝擊，有不少傳教士因教會繳納贖金得到釋放，卻也有傳教士被中共俘虜殘害的結局。<sup>115</sup> 為此，傳教士們加入指控中共暴力的行列，他們是中共暴力直接的受害者，成為肉票甚或殺戮的對象。<sup>116</sup> 在斯近信的憶述中，獲取金錢物資是中共俘虜人質的關鍵動機，以便發起武裝革命來奪取政權。<sup>117</sup>

行軍的一路上，斯近信記錄了紅三軍俘虜國民黨的軍人、政府官員、地方商賈等不同類型的人。他們遭遇嚴酷的對待，四肢困鎖，身體虛弱，是否被安排騎騾，就要看繳交贖金數額，否則會被處決，以示中共的軍紀。<sup>118</sup> 斯近信描述到：「無須問原因，當共產黨前進時，在途中佔領了不同城鎮，不斷地綁架人，要求寫贖金的信件，然後又再次出

<sup>112</sup> 斯近信夫婦是1931年來華，第一年在武昌學習語言，第二年被差派到四川龍潭，有九個月時間協助包忠傑牧師工作，1933年他被委任負責彭水傳教站的教務。

<sup>113</sup> Gertrude E. Smith, "Reds Attack Pengshui and Take Howard Smith,"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Kweichow-Szechuan Mission of the C&MA* (C&MA National Archives): 164-67.

<sup>114</sup> 成邦慶著，劉家峰和劉莉譯：《一個外國傳教士俘虜的長征：成邦慶回憶錄》（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2016），頁15~17。

<sup>115</sup> 陳智衡：《紅火淬煉》，頁93~105。

<sup>116</sup> 楊衛華：《十字架下的馬克思》，頁309。

<sup>117</sup> "Howard A. Smith's deliverance from Communist Guerillas,"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Kweichow-Szechuan Mission of the C&MA* (C&MA National Archives), 168.

<sup>118</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67.

現空缺。言語無法形容這樣的恐怖，這些俘虜有無數可怕的悲劇。」<sup>119</sup>斯近信一旦有休息時間會讀聖經，有共產黨人見到便問他，基督教的聖經是否講到如果一側臉頰被打，就得轉另一側臉再給人打？斯近信告訴他，這是真實的，基督徒要為自己的信仰付出考驗。不過，這位共產黨人表明紅軍對這種「不抵抗主義」的強烈反對。<sup>120</sup>

另外，紅三軍為了增加贖價，政委夏曦要求斯近信寫信給美國領事館，增加兩項釋放的條件。首先，上海國際殖民署要給共產黨人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權利；其次，現有共產黨人及政治犯不可交於南京國民政府，按照中共指定的方式釋放這些人，用來交換紅軍俘虜的外國人。<sup>121</sup>自斯師母抵達武昌宣道會以後，美國傳教士被中共俘虜的消息很快傳到外界，中美報業數次報道斯近信被共產黨人俘虜勒贖的新聞。時任宣道會華中差會主席蘇芳亭牧師（E.F. Stewart）親自到重慶，向四川省政府當局施壓，再經美國駐漢口領事館與國民政府多番交涉，四川省政府同意對斯近信被中共俘虜負責，表示盡快解救人質。不過，四川省政府的救援措施，始終未有有效的進展。<sup>122</sup>

有關是否要交贖金的問題，在1934年5月27日華中宣道會公開明言如下立場：

- 1) 斯近信牧師的父親是美國一名工人，目前失業。斯近信剛到中國不久，他的月薪只有幾十美元。
- 2) 美國宣道會沒有能力為他提供任何幫助。近年來，支付給宣道會的傳教士薪水有所減少，一些學校也被關閉。
- 3) 關於贖金和藥品，美國領事已給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發電報，要求他採取措施營救斯近信牧師。<sup>123</sup>

<sup>119</sup> H.A. Smith, "So Great a Deliverance,"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X, no.41 (13 October, 1934): 649.

<sup>120</sup> Smith, "So Great a Deliverance," 649.

<sup>121</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79.

<sup>122</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94, 104.

<sup>123</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102.

同時，美國宣道會總部表明拒絕支付贖金的政策，與斯近信師母和家人反對支付贖金有相同的原因，若是交出贖金，會導致在華傳教士不斷被抓勒索的危險。<sup>124</sup> 然而，這並不是說宣道會任由斯近信坐以待斃，除等待四川國民政府救援之外，華中教區委任熟悉川黔地形的鄭哲克尋找方案解救斯近信，安排中國人在營地了解斯近信的情況。<sup>125</sup> 實際上，斯近信自己沒有一刻停止策劃逃跑，因為他非常清楚宣道會支付龐大贖金幾乎是不可能的。<sup>126</sup>

紅三軍訓練有素，時常進行軍事行動的戰略，在天未亮前便進行一天的行軍，基本每日在山區行40公里以上的路途。自進入貴州荒野又陌生的地形以後，斯近信逃脫的機會甚小，尤其是他被關在軍營中央，營地駐紮大約有三十里地的範圍。同時，斯近信感到情況愈來愈危險，紅軍得不到贖金，不會長期供養着人質，按慣例會處決他。為此，他每天留意路途區域的特徵，敏銳記住人們在字裏行間說的地名。<sup>127</sup> 在他被俘虜的第五十二個夜晚，軍營突響號聲進行軍事演習，結束已是凌晨一點，守衛兵疲倦熟睡。此時斯近信意識到這是一次逃脫的機會，他立即與中國助手全力逃跑到附近一座山林。不到十分鐘，守衛發現斯近信逃脫，軍營警報再度響起，紅軍展開大規模的搜捕。儘管紅軍夜晚行動力強，而斯近信兩人行走偏僻山路，他們時有藏匿農舍，時有改變路線至荒郊。他們曾目睹逃跑被抓回來的人，被紅軍殘酷地處決，這使他們以不斷變換路線的策略逃跑。

在逃亡的路上，斯近信不僅精神處於高度緊張，身體也極為虛弱，甚至與中國助手走失分離，歷經六十天荒野生活，才被四川軍閥尋獲，最終在一位慕道友老人的幫助得以順利離開。<sup>128</sup> 斯近信先返回彭水，

---

<sup>124</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99-100.

<sup>125</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103.

<sup>126</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70.

<sup>127</sup>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111.

<sup>128</sup> Smith, "So Great a Deliverance," 650.

探望福音堂的基督徒，再到漢口與妻兒相聚。<sup>129</sup>此後，宣道會調派斯近信夫婦到安徽傳教站，以免他在川黔地區遭到中共的報復。不出所料，中共對斯近信的逃脫感到非常憤怒，共產黨人在蕪湖多番搜尋斯近信，不過抓捕計劃始終未能得逞。<sup>130</sup>

宣道會華中差會在1934年7月24日的年議會上，斯近信向眾多傳教士講述被擄逃亡的經歷，留給在場的人有深刻印象，「他自己感到沒有任何的榮譽，中國許多人也有類似經歷，比他更值得戴上殉道者的冠冕，只是沒有得到拯救。他真誠地感謝那些為他祈禱的人。在整個試煉中，他一直意識到被祈禱的氛圍包圍着，促使他一直保持信仰生活。」<sup>131</sup>以此而言，傳教士清楚西方人身分，在邊陲時有被搶劫、俘虜和威脅生命的遭遇，然而斯近信有意避免用個人成功逃脫來渲染英雄情結的形象，卻以被擄為例表明傳教士對中國人的處境認同，因為暴力恐懼與中國傳教活動的相遇是十分普遍的情況。<sup>132</sup>

<sup>129</sup>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頁54；H.M. Clark, "Central China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IX, no.43 (27 October, 1934): 680.

<sup>130</sup> R.E. Brown, "Faithful unto Death,"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LXX, no.9 (2 March, 1935): 136-37.

<sup>131</sup> "Howard A. Smith's Deliverance from Communist Guerillas," 168.

<sup>132</sup> 對於斯近信被紅三軍俘虜，有另外一個敘述版本，筆者將內容摘錄如下：「1934年5月8日，紅三軍攻佔彭水後，爭取了一名叫斯密斯的傳教士支持。他會書畫，照相，也會西醫外科。由於洪三軍缺醫少藥，賀龍找他商量為紅軍買了一批藥品，斯密斯欣然同意。於是，賀龍將他與夏曦、關向應共同籌集資金交於斯密斯，斯密斯則說：『先別給我錢，由我太太去武漢購買；到時，紅軍派人去取就行了。』紅三軍在離開彭水時，斯密斯一道隨軍前行。為了打消斯密斯對紅軍的畏懼懷疑，賀龍常與他下棋、談心以消除他的戒備心理。紅軍進入楓香溪後，斯密斯被委以秘書職務。紅軍在黔東所發行的宣傳畫中一部分就是出自於他的手；他還為紅軍繪製黨旗等。7月上旬，斯密斯隨紅三軍沿河淇灘，因為家庭原因，他於7月4日乘一隻小船離開蘇區。賀龍得知後派人將他的太太送到武漢。斯密斯為紅軍辦事的故事，一直是紅軍宗教統戰政策勝利的榜樣和範例。」張體珍：〈黔東蘇區黨的宗教政策探析〉，《中共銅仁市委黨校學報》總第68期（2014年第4期），頁22~23。然而，作者在書內沒有註明這段資料的來源。實際上，這類刪改俘虜傳教士勒索贖金的史實也出現在不少著作中。有如下書籍：中共四川省涪陵地委黨史工委：《賀龍在川東南》（北京：解放軍，1998），頁480；譚厚鋒、林建曾和伍娟合著：《貴州基督教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7），頁134~135。

從傳教士的經歷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傳教士對中國相當的熱愛和信仰忠誠，在那個戰火紛飛、局勢動蕩的年代，誰能做到甘冒巨大風險，輾轉千里到川黔邊陲呢？因此，不難發現華中宣道會應對綁架勒索的保守政策及其措施，正是兌現宣道會一貫的宗教信念，即苦難、危險是傳教生涯的一部分。尤其是位於內陸川黔地域的傳教活動遭遇革命暴力威脅的機率高，既然是他們日常生活的經歷，傳教士就無畏地秉持救贖人信念應對諸多挑戰。可以說，該事件進一步加深宣道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運動的認知，從而於中共建政前夕宣道會西差會以敏銳的判斷，作出撤離等應變措施。<sup>133</sup>

## 五 結論

在民國動蕩時期，日益加劇的民族主義風潮中，基督教受到抨擊，被當作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同謀，傳教士在邊緣民族中的傳教活動，同樣也屬於政治上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與中國西南部邊界地區多元民族共事的傳教士，被指責為基督教「教化工程」的代理人，顯然這與民族國家的工程相衝突，視為一種在政治層面的競爭對手。<sup>134</sup> 另外，有學者在討論基督教在西南地區的局限性，指出傳教士無視多元民族的傳統文化，以近代西方資本階級社會的標準，導致本地民眾羣起而反對，影響

---

<sup>133</sup> "Communism and Christ's Coming," *The Alliance Weekly* 83, no.13 (27 March 1948): 194, 196; A.G. Bollback, *Giants Walked Among Us: The Story of Paul and Ina Bartel* (Chicago: Wingspread Publishers, 2002), 63.

<sup>134</sup> 羅安國：〈民國時期的民族構建和人類學：四川南部的傳教人類學事業（1922-1945）〉，特木勒編《多元族群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2010），頁105～106。

本地教會的衰落。<sup>135</sup>不過，羅安國（Andres Rodriguez）提出與傳統觀點不同的看法，就基督教在中國現代化作出努力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傳教士對中國認同的形式。<sup>136</sup>

有鑒於基督教與近代中國邊陲地區的糾葛，本文的研究表明，儘管二十世紀上半葉在華傳教運動趨向社會福音之勢，但是宣道會從未改變起初傳教宗旨，持定基要信仰一以貫之。他們所關心的方向相當一致，向未得之地開拓佈道。於二十年代華中差會進入川黔東陞地區，相繼設立松桃、秀山、彭水與龍潭等四個傳教站與七個佈道所。川黔東部地處山脈重巒疊嶂，宣道會開展佈道實屬不易，這裏的社會秩序極不穩定，傳教活動亦無倖免於難，在苗寨之間的暴力搶掠、匪患嚴重、武裝革命皆對傳教士構成巨大威脅，在不得保障的社會中傳教，反映出宣道會實踐以「邊緣」草根社羣為主體的救贖認同感。即使在社會暴力衝突的各種張力中，傳教士與本地信徒依然將傳播福音看成個人和教會身分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宣道會強調向未得之民傳教的認同感，對在川黔邊陲羣體中傳播具有重要性。

再則，不同於以往研究主要關注傳教士在西南地區扮演「救星」的角色，基督教興辦的教育、醫療等事業將民眾「教化」，使他們由內到外從蠻夷到開化。宣道會延續其傳統的佈道方略，並非致力興辦教育、醫療等事業，也就沒有引起大規模羣眾改宗的條件，其傳教現象主要呈現有兩個重點：即早期第一代基督徒多半是處於生存危機中信教，以及傳教士注重培養本地傳道人共同承擔教務工作。因此，從宣道會在川黔東陞地區行動經驗的意義來看，傳教士以堅貞的信仰和艱苦卓絕的犧牲

---

<sup>135</sup> 東達人：〈族羣認同與文化交流——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西南〉，特木勒編《多元族羣與中西文化交流：基於中西文獻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2010），頁22～23；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區傳播史》，頁324～357；黃宣衛編：《國家、族羣與基督宗教：西部苗族調查報告》（台北：唐山，2016），頁10。

<sup>136</sup> 羅安國：〈民國時期的民族構建和人類學〉，頁106。



信念，通過主動融入將這一種宣道精神移植、塑造及影響了本地邊緣族羣，並且在傳道人員的努力下，讓本地信徒更加認同這個信仰。這種教會現象說明傳教士與本地信徒沒有懷抱自我邊緣化的心態，而是願意發揮福音對個人、羣體的救贖影響。可見，在地理邊緣的稜鏡下，宣道會簡化為在單一的普遍意義上的傳教模式，不具備擁有宗教資本以及扮演殖民擴張「教化工程」的政治想象，從而表明一種基督教在西南邊陲地區的傳教活動有着多樣性特徵。

## 撮 要

四川東南與貴州東北部的交界是位於偏遠山區，由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基督教宣道會首次派遣傳教士來到這裏，將基督教信仰傳給漢、苗等多元聚居族羣，並且常駐開展傳教活動。宣道會在十餘年間先後建立以松桃、秀山、彭水和龍潭為傳教據點，範圍涉及川黔東部比鄰的縣區。本文通過這一段被忽略的基督教在華傳播史，梳理宣道會採取的福音佈道路線，表明其在川黔東部的邊緣性特點：注重信徒改宗的身分認同、吸鴉片者的宗教治癒以及在苗蠻的福音開墾。由此進一步說明宣道會服務川黔的「邊緣」屬性，在不得保障的社會機制中。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傳教士經歷被搶劫、綁架時，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兌現了「未得之地」的傳教信念。故此，宣道會在中國西南內地的傳教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

## ABSTRACT

The border between southeast Sichuan and northeast Guizhou is located in a remote mountainous area. In the 1920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irst sent missionaries to this area to spread the Christian belief to the Han, Miao and other multi-ethnic groups, and to carry out permanent Missionary activities.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established its missionary bases in Songtao, Xiushan, Pengshui and Longtan, covering neighboring countie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and Guizhou. Based on this neglected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angelical preaching route adopted by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pays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local missionaries shows its marginal characteristics in eastern Sichuan and Guizhou: Focus on the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of converts, religious healing for opiates and preaching the Gospel in Hmong. This further shows the "marginal" attribute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serving Sichuan and Guizhou in a social mechanism without protecting.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is that when the missionaries were robbed or kidnapped, the measures they took to deal with fulfilled the missionary belief of "Unengaged People Groups". Therefore, missionary socie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ssionary work in southwest China.